doi:10.3969/j.issn.1001-8794.2023.05.005

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的 实践逻辑及问题反思

吴倩莲¹, 陈捷¹, 冯力², 李祥¹

(1.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贵阳 550001; 2.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000)

【摘要】社区教育是培育搬迁居民内生力的重要途径,推进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应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重点工作。基于四个易地扶贫搬迁点的田野调研,从社区教育主体、社区教育内容、社区教育形式和社区教育目标四个维度进行审视发现,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的实践逻辑体现在生计逻辑、市民逻辑、效率逻辑、教育逻辑和发展逻辑五个方面;存在教育目标低位态、学习主体参与缺位、家庭教育内容缺失、感恩教育重形式轻内涵等问题。优化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机制,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一要深挖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内涵,推进社区课程和教师队伍建设;二要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治理,形成社区教育参与合力;三要整合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资源,发挥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最大功效;四要利用现代化多元信息工具,丰富易地扶贫搬迁点多元社区教育形式;五要提升搬迁居民文化适应能力,培养搬迁群众主动学习的社区意识。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实践逻辑;内生发展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3)05-0026-08

一、问题提出

易地扶贫搬迁是基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针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生态现状,而实行的从源头上阻断贫困的战略措施,通过多年努力,“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1]如今易地搬迁工作已转入后续扶持新阶段。易地扶贫搬迁点(以下简称“易扶点”)社区是搬迁居民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和主要活动空间,易扶点社区教育融入

原子化搬迁的居民生活空间,是后搬迁时代居民社会适应、生计维持、社会资本提升的重要途径,因此,推进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应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重点工作。学界目前关于易扶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建设、现代化视角和空间再造视角提供的多样化的社区建设理论,社区教育多被作为一个切入点讨论。有学者从城乡融合视域^[2]探究易扶点移民社区教育发展,也有学者研究易扶点人员文化适应的教育问题,^[3]但总体上讲,关于易扶点社区教育的研究相对单一,大多为生计教育,零散地分布在社区建设研究之中,特别是缺少对易扶点社区教育的整体性研究。

社区是易扶点居民安置的主要聚居单位,社区教育对搬迁居民的生计、生活、意识、观念等具有重要影响。这既表现在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表现为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更体现在社区教育有利于激发搬迁居民共同体意识上,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的内生力。基于此,本研究着重审视易扶点社区教育的实践现状、实践逻辑,反思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思考易扶点社区教育机制优化的策略,从而为推进易地扶贫

【收稿日期】2022-07-18

【基金项目】2019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西部项目“民族地区教育内生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为 XMA190283

【作者简介】吴倩莲(1997—),女(布依族),贵州独山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法律;陈捷(1997—),女,广东湛江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法律;冯力(1994—),男,河南信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法律;李祥(1981—),男(苗族),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教育政策与法律。

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开展社区教育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经验支持。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次田野调研共选择了四个社区:六盘水市的A社区和B社区,毕节市的C社区和D社区。2018年7月居民逐渐迁入A社区,共安置9个乡镇易地扶贫搬迁居民2253户972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214户9166人,占比94.25%。B社区于2017年开工建设,共安置贫困群众588户277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572户2696人,占比97.3%,目前已全部完成登记搬迁入住,入住率100%。社区居民不乏来自苗族、彝族、回族、水族、蒙古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且以苗族、彝族居多,其中苗族421人。C社区成立于2019年4月,社区内居住着汉族、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共计2208户977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051户9096人,占比93.08%。D社区文化活动丰富,管理有序,内设幼儿园、文体活动中心等公共基础设施,妇联、团委干部会经常性的对社区内的居民进行指导,指导内容包括健康安全、法制宣传、家庭教育等。

2. 研究思路与理论基础

本研究主要以贵州省四个易扶点社区教育田野调研数据为分析内容,总结出易扶点社区教育的逻辑;挖掘易扶点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易扶点社区教育的实践现状;对易扶点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易扶点社区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要根植于易扶点社区教育的发展目标和现实困境。易扶点社区教育的目的在于以空间转换的方式帮助生态贫困居民摆脱生计贫困,最终促进居民内生发展。首先,搬迁居民的贫困源于艰苦的地缘。空间贫困理论关注人口贫困与空间分布的关系,“将贫困和空间地理因素联系在一起,主要研究自然地理田间对贫困的影响力,以及贫困的空间分布情况”。^[4]其次,易扶点社区环境对于新进移民来说,还是一个待熟悉的环境,根据需要层次理论的解释,我们认为新进移民在满足最基本的生计问题后,会产生更高层次的发展诉求,调研结果也反映出这一特点。最后,搬迁居民需要积累自身的人力资本,从而使其在社会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岗位与资源。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theory)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关于人类生产能力的崭新思路。该理论

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该理论在易扶点社区教育中表现更为明显,通过社区教育的实施,提高了社区移民的生存技能、生产能力以及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社区教育能为社区移民的生存保驾护航。

三、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的实践现状

1. 社区教育主体

社区教育主体是指社区教育活动举办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调研中发现易扶点社区教育主体呈多元化,主要分为外援型主体和内生型主体。一是外援型主体。从区域视角看,虽然政府是易扶点社区工作的重要主导力量,但在具体实践中,易扶点社区出现群团组织、社会公益机构、学校和企业四种主要外援型主体。群团组织主要是各级妇联和团委,其作为协助社会服务机构,是易扶点社区建设的有力支持者,同时也是社区教育的主体;社会公益组织和社区主要以联合会的形式开展合作,不仅为社区教育提供物质帮助,还分派志愿者开展义务社区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通过自发,或者与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联动,推动易扶点社区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一些职业学校在社区教育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企业通过与社区开展项目合作,从提供岗位的角度为易扶点社区提供生计教育。二是内生型主体。内生型主体是指社区内部自主组织社区教育活动的主体,主要为社区管理者和居民自身。社区管理者作为社区教育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其工作成效关系到社区教育活动的投入和效果,主要体现在与多方组织合作共同开展社区教育;居民作为社区的主要成员,是社区之所以成为社区的基础,包含各年龄段的成员,但主要是孩子和老人。

2. 社区教育内容

社区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生计教育、文化教育、氛围教育、卫生教育和感恩教育等。一是生计教育,生计教育主要是指职业技能培训,其目的是通过培训提升居民自身的“业务”能力,以满足工作岗位的需要,进而提高家庭收入并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有发展”的转变。生计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家中有小孩要照顾的妇女和老人。因此,社区主要开展生产规范小、投资少、风险小、成本低和易操作的基本生活用品生产技能培训。调研发现,一些脱离群众文化基础和短期需要

的培训,如电商培训等往往效果不佳。二是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旨在提升社区居民道德、文化水平,以促进学习型社区的形成。易扶点社区针对服务对象的不同,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针对儿童放学早、家长下班晚的情况,为社区儿童开设“四点半课堂”和“亲子书屋”等;针对社区家长进行家庭知识教育和法治知识教育,既能提升家长的文化水平以促进家庭教育水平的提升,又能强化家长法治思维以推进现代化社区的创建;针对老年群体开设了更加丰富的社区教育活动,“书法室”“棋牌室”“老年活动室”“文化传承室”等,充分体现了“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理念在易扶点社区的应用。三是氛围教育,易扶点氛围教育建立在搬迁居民原有生活环境和现代社区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旨在提升社区的精神活力和凝聚力。易扶点社区氛围教育内容主要是易扶点居民民俗文化和现代社会主流歌曲、艺术等,通过民俗文化教育缓解易扶点居民文化差异的心理落差,通过现代社会流行文化教育帮助易扶点居民快速融入当下现代化社区。四是卫生教育,易扶点社区开展的卫生教育不仅保证了社区的清洁,同时帮助易扶点社区居民改正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其教育对象涵盖全体居民,教育内容包括居民个人的衣着、饮食、房间卫生及社区整体的楼层、道路卫生。五是感恩教育,教育目的是唤醒易扶点居民的感恩意识,加强社区团结互助的凝聚力。易扶点感恩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易扶点帮扶政策等,以此提升群众感恩意识,强化其内生发展动力。

3. 社区教育形式

易扶点社区教育形式具有针对性和多样性特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走进车间,表现为工学结合的教育形式。“车间教育”是易扶点生计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专业技师到现场实操培训,从而提升易扶点居民的基础生计能力以获得经济回报。例如,易扶点社区的“巧娘工作坊”社区生计教育车间,由社区居委会和某鞋业合作,生产低技术含量、低成本的鞋子,带动社区妇女、老人等劳动力获得经济收入。二是依托学校,表现为社校结合的教育形式。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易扶点的社区教育,以调研点的“四点半课堂”为例,担任“四点半课堂”的教师多为志愿者,其中学校教师占有较大比例,“四点半课堂”多是在当地学校积极参与和支持下进行的,虽主要面向学生群体,但由社区作为中介,间接促进了当地群众的文化教育,此外,易扶点的家庭教育指导、法治教育等多是由社区和学校合

力开展。三是浸润文化,表现为引领需求的教育形式。易扶点多数群众文化层次偏低,文化不适应表现明显,一些群众在阳台养鸡、草地种菜的行为被社区工作者误解为不注意卫生、不讲公德等,这本质上是空间变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和碰撞。调研中我们发现,易扶点社区教育较为注重文化的延续和链接,如“乡愁馆”不仅陈列搬迁前的生产工具、生活场景、自然景观等图片,还以文字的形式介绍当地文化的发展历史和背景,又如开设了“家长书屋”,部分内容采用了扫码听书的形式,有利于不识字的家长学习知识,“家长书屋”书籍种类丰富,不仅包括生活类书籍和技能类书籍,还包括哲学、政治学等精神追求类书籍。调研点积极开展“专题讲座”“三新一清洁”“广场舞大赛”等活动,并以谱曲民谣等形式传颂社区公约,尽可能在文化上适应易扶点群众的文化特点,其操作性强,实效明显。

4. 社区教育目标

社区教育对象的文化程度决定了社区教育目标的层次性。易扶点社区群众的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或初中,这就决定了易扶点社区教育目标划分就业目标、管理目标、文化目标和氛围目标。首先是就业目标,要实现家门口就业。易扶点社区的独特性在于搬迁成员因生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生计方式的改变,因此,搬迁后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居民生活,以防由于生计问题而出现搬回去的现象。该目标通过社企合作的教育途径提升社区低素质劳动力成员的技能水平,实现家门口就业。其次是管理目标,要提升社区管理效率。易扶点社区管理者采用卫生评比等方式,强化居民集体意识,重在提升居民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从而提升社区管理者的管理场域,提升社区管理效率。再次是文化目标,要完成基础知识普及。易扶点社区居民大多来自“一方土地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居民文化水平大都较低,通过讲座等形式对社区居民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例如安全、禁毒、消防、用电、防火等,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同时可以提升家庭教育水平,阻断易扶点代际贫困。最后是氛围目标,要创建和谐社区。易扶点社区组织开展多种文化教育活动,通过拓展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实现社区和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积极贡献。

四、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的实践逻辑

1. 生计逻辑是易扶点社区教育的首要目的

易地扶贫搬迁以生态移民为基础,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现实生计困境出发,重在解决

生态贫困户的生计问题。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解释,生存需求是人的最基本需求,生计接续成为易扶点社区教育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直接关系到能不能“稳得住”的问题,易地扶贫搬迁不只是简单的空间移动,有学者提出,这还意味着生存来源的暂时丧失与生活成本的提高,“搬迁初期带来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大幅下降会使原本生计就十分脆弱的搬迁户更加难以生存”。^[5]有研究发现,贵州易扶点居民搬迁后增收的主要因素来自于生计资本的人力资本,^[6]社区通过生计教育的形式,传授易扶点居民基础的生存技术、技巧和技能,从而提高易扶点居民的人力资本,进而以高人力资本为基础推动作为搬迁户内生动力重要基础的生计资本^[7]的增长。可以说,生计逻辑是通过社区教育促进易扶点社区居民生计方式的内生转变,推动易扶点进一步满足居民的“稳得住”“能致富”的物质需要。

2. 市民逻辑是易扶点社区教育的时代趋势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8]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城镇化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在实际的搬迁过程中,居民在搬迁前后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发生颠覆性的转变,致使其在市民化耦合的过程中面临“身份角色层面困境、精神贫困问题突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搬迁人口就业不足、搬迁意愿不强”^[9]等困境。而易扶点居民市民化的重心在于其身份的市民化,从角色层面讲,“社会身份完整、角色期待明确、互动环境良好,以及新旧角色间转换通道顺畅等,都是顺利实现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前提或条件”。^[10]社区教育的市民逻辑是通过促进易扶点居民身份的市民化、构建良好的社区环境、提供新旧身份良好的转换氛围,从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在实践中应遵循不同层面角色的转变规律,通过提升易扶点居民的生计水平来定位其职业角色;通过强化易扶点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来明确其家庭角色;提高易扶点社区居民的精神素养来把握其社会角色。以充实的社区活动营造出良好的社区氛围,从而推动易扶点社区居民市民化身份的转变。

3. 效率逻辑是易扶点社区教育的外在表现

易扶点社区教育的效率逻辑体现在以教育设施的制式化刚性发展推动社区教育效率的提升。公平和效率是易扶点社区教育价值选择的重要因素,经济学视角下,实践的效率与公平总是在对立中促进交融和均衡,实现制度正义下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但易扶点社区教育的效率逻辑并不等同于经济学视角下的效率逻辑,易扶点社区教育的效率逻辑体现在以规范化的教育资源供给、选择见效快的教育内容推动社区教育的效率提升。在教育资源供给上,易扶点居民搬迁前生活条件差,居民往往以生计能力实践为主,忽视教育,且教育设施不齐全,精神文化建设往往因为外部的刚性设施条件不达标而无法很好地实行。在对易扶点教育设施的田野考察中发现,易扶点教育对象涵盖各年龄阶段人群,在教育种类上囊括各种文化艺术、传统手艺等。例如,不同社区“家长书屋”的建设,为满足家长知识文化需求提供了硬件设施,方便了居民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社区和谐。在教育内容上,早期易扶点社区教育更多是短期的职业技能培训,着重做好“稳得住”“能致富”工作,充分体现了社区教育的效率逻辑。综上,易扶点社区教育效率逻辑展现出的教育设施规模化发展正是社区教育稳步实施的外部表现。

4. 教育逻辑是易扶点社区教育的内在追求

教育逻辑作为社区教育最本质的属性之一,是易扶点社区教育的内在追求。教育逻辑的重点在于对易扶点居民的“情感唤醒”,旨在以“扶志”的方式提升社区居民的内生发展能力,促进居民和社区的双内生发展。标签理论研究成果显示:“贴标签者与被标签者之间有一种‘区隔’,或曰‘能量差’,这种‘区隔’或‘能量差’使得贴标签者相对于被标签者而言处于更为强势的位置,被标签者则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位置。”^[11]贫困居民搬迁后,本土文化所承载的知识、技能、意识、价值观等会与现代化社区精神文化不相融甚至发生冲突,面对现代化社会环境,一些易扶点居民容易产生“弱者”思维,滋生自卑情绪,更为严重者会自我放弃,无法通过社区建设习得自我发展能力。社区教育中的教育逻辑就是通过提升易扶点居民知识文化水平和文化自信,唤醒居民自我发展意愿,从而增强易扶点居民的文化内生力,因此,教育逻辑重在“扶志”。结合易扶点的文化实际需要开展社区教育,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保障。

5. 发展逻辑是易扶点社区教育的核心理念

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易扶点社区发展逻辑的核心理念就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易扶点群众在搬迁前,受现实生产力束缚,政府没有条件为其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也正是基于此,易扶点社区教育的核心理念是追求社区居民的全面发

展。社区教育的内容、形式、参与主体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发展逻辑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立场,不能仅仅满足于“脱贫”的现实需要,在生计教育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的社区教育需要就会彰显。从长远看,易扶点社区教育的发展逻辑诉求需要基于内生发展立场,更加深入地提高人的自主发展意识、唤起深层次的群体发展共识意识,实现易扶点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相契合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易扶点因为选择搬迁对象标准的原因,社区弱势群体多,精神病人、孤儿、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员等特殊群体教育、管理难度大,因而,其发展逻辑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更具特殊性和针对性,任务也更加艰巨。

五、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问题的反思

通过对易扶点社区教育的实践现状和实践逻辑进行审视,我们认为,易扶点社区教育特点鲜明、成效显著,但实践中依然存在亟待解决的现实性和发展性问题,这事关搬迁群众的自我“造血”能力提升,更是后搬迁时代如何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回答的问题。

1. 教育目标低位态

社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易扶点因教育对象的特殊性,社区教育迫于长期满足生计教育的现实需要,缺乏更高层次的教育内容,随着生计贫困问题的缓解,以及易扶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诉求的出现,这种低位态教育目标已无法满足群众教育需要。调研中发现,这种低位态教育目标主要体现在易扶点社区管理者对帮扶目标定位不清晰,致使社区教育目标偏移,忽视了搬迁居民精神贫困问题,例如,调研中有的干部说:“谁家灯泡坏了都是我们工作人员上门换”,把群众自身可以解决的事情作为一种担当和职责,是对其工作定位异化的典型表现。从搬迁群众角度看,部分群众认为自己是搬迁后的弱势群体,搬迁后政府和社区要解决所有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易扶点部分群众过度依赖政府和社区,依赖搬迁贫困救济金生活,忽视自身作为人的劳动与发展的本质属性,滋生出不肯脱贫思想,从搬迁前的生计贫困户转化为搬迁后的精神贫困户,这需要依靠社区教育目标的高层次定位来改变。

2. 学习主体参与缺位

易扶点社区教育学习主体呈现多元化特点,在实践中,学习主体通常是被动地参与社区教育,其自身并未激发出更深层次的教育需求,给人造成仅需

要满足生计教育的假象,这也是教育目标低位态形成的主要原因。学习主体参与缺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社区教育内容上,易扶点社区教育内容供给和需求不一致。社区教育内容的确立,通常是外来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抑或社区工作者结合工作要求开发和设计的,学习主体只是被动的参与,学习主体自身的学习条件、能力和需求往往不被重视,重复学习、高难度学习、工学矛盾、学不致用等问题反映出学习内容缺乏针对性,这就导致主体参与学习后其内生能力提升有限。二是在社区教育方式上,易扶点社区教育方式缺乏创新,机械式讲述成为主要的教育方式。在调研点我们发现,简单移植中小学校教育方法,如通过卫生评比给不同家庭插小黑棋、小红旗;通过积分超市引导群众行为等,虽有一定效果,但容易造成社区居民仅仅是被动参与,其主人翁意识缺失,内生发展意愿淡薄。

3. 家庭教育内容缺失

家庭教育作为易扶点社区教育的主要实践领域,有其特殊诉求,也具有重要价值,但社区教育对家庭教育关注度不够,家庭教育也没有成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重要参与力量。具体来说,家庭教育内容缺失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易扶点社区教育内容尽管包括生计、文化、氛围、卫生和感恩等,但对家长的教育指导仅限于家长自身受益的技能、知识、道德和情感等,缺少对于家庭教育关键性的知识和方法的教学,易扶点社区家长无法通过社区开展的家庭教育途径提升自身的家庭教育能力,以至于部分易扶点社区家长笃信自己非科学的教育方式,从而无法保障易扶点社区家庭教育质量,进而使得其子女的教育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易扶点的家庭教育对象特殊,易扶点家庭教育指导更具专业性和复杂性,如困境儿童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者需具有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及综合性专业能力,对社区教育者本身是个不小的挑战,又如调研点一些“家长书屋”虽然藏书丰富、种类繁多,但利用率较低,这和家长自身文化、信息技术运用水平等有关,而且许多书籍偏理论性、学术化,且对于文化层次不高的家长来说,家庭教育指导并不能有效的转化为家庭教育能力,最终出现了社区教育在理念上重视家庭教育指导,但在实践中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出现缺失这一怪象。

4. 感恩教育重形式轻内涵

感恩教育是易扶点社区为提升居民感恩社会的意识而进行的一系列显性及隐性的社区教育活动。感恩教育对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少数民

族群众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推动不同民族群众的团结合作和交流具有重要价值。但感恩教育形式不得当,内容不合理则会加深群众“弱者”的自我认知,滋生群众“贫困”标签思维,强化“不肯脱贫”思想。在走访的社区中我们发现,感恩教育偏好形式主义,许多超市、商场直接以“感恩超市”“帮扶餐厅”等命名,随处可见“感恩”“帮扶”字样,这强化了搬迁居民“被帮扶者”的身份。超额的感恩教育为居民贴上了“被扶贫者”标签,同时搬迁居民背负“弱者”的心理压力,在日常生活中则可能产生自卑、懒惰的心理,从而限制了自身生计、家庭教育等能力的提升,阻碍了搬迁居民内生力的发展。根据标签理论,搬迁居民会因为过度的感恩教育产生低内生力,导致其长期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扶贫要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易扶点感恩教育虽然很重要,但更需要从社区教育的角度改进引导方式和教育内容,实现感恩教育的真正目的。

六、易地扶贫搬迁点社区教育机制优化的对策与思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易扶点社区教育质量的提升,要立足于易扶点居民生活和文化水平现状,以社区居民个人全面发展为诉求,融合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等发展理念,同时依托教育现代化和教育信息化的技术和资源,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易扶点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具体而言,易扶点社区教育机制优化,应把握以下几点。

1. 深挖易扶点社区教育内涵,推进社区课程和教师队伍建设

社区教育内涵发展即社区教育质的方面的正向变化,^[13]深挖易扶点社区教育内涵,就是要结合易扶点社区教育发展的诸多现实因素,深入理解易扶点社区教育的目的、对象、内容和形式,推动社区课程和教师队伍建设。首先,社区教育课程的建设应充分考虑易扶点社区生计贫困和文化贫困现状,把搬迁元素融入到社区教育课程体系之中,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监管等层面抓落实,构建易扶点社区教育课程体系。例如,在课程教材的编制上,不仅要涉及社区教育基本知识(卫生、安全和法治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要结合其文化、资源特点增加生计技能课程内容,有针对性的为易扶点群众生计教育提供课程资源。其次,应扩大社区教师的遴选范围,以公开竞聘、兼职聘用、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广泛招募社会有相关经验的技能

人才和文化专家,同时应该加强社区教师的教育培训,帮助教师快速融入搬迁社区文化环境,使教师成为助力易扶点社区发展的推动引擎。

2. 加强易扶点社区教育治理,形成社区教育参与合力

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后搬迁时代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社区教育治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易扶点社区教育治理能力是提升易扶点社区治理水平和搬迁居民的社区自治能力的重要切入点,加强治理的关键是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合力机制。首先,要强化相关行政部门的社区教育行政责任担当,相关部门应履行经费保障、编制管理、监督评价等政府职责,特别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为易扶点社区教育法治化奠定基础;其次,要激发易扶点居民内生教育意识,这要求易扶点社区教育的建设要广泛听取搬迁居民的自身意愿,并基于搬迁居民的现有条件和现实需要,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社区教育实践,提升居民社区教育治理参与动力;再次,要发展和吸引专业力量参与其中,提升社区教育指导的专业化水平,尤其是激发社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专业师资和组织的参与热情,在实践中,调研点探索的以行政给付或者行政奖励等形式鼓励社会主体参与社区教育的方式值得我们推广。总体来说,易扶点社区教育治理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社区、群众等多主体的合力参与。从制度上看,我们还需要理顺主体间的权责利问题,用好法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手段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的美好愿景。

3. 整合易扶点社区教育资源,发挥易扶点社区教育最大功效

易扶点社区教育资源可以分为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文化资源,人力资源以行政人员、群团组织、社会志愿者、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居民等为代表;物力资源以社区教育设施、教育产品等为代表;文化资源以传统生存文化和现代社区文化为代表。易扶点社区教育要发挥最大功效,就需要整合易扶点社区教育的这三种资源,保证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协同促进搬迁居民内生力的提升。首先,社区要合理利用政府的拨款与社会各方的捐赠资源和投资,利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扩大社区教育资源来源的同时要优化社区资源配置;其次,要切实提升易扶点社区管理者资源协调与整合能力,融会贯通各项社区教育内容,了解社区教育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功能定位,保证社区教育资源达到最优化运用;最后,不仅要合理利用社区教

育资源,还要充分利用社区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资源和家庭教育资源,同时融入搬迁居民特色文化,实现易扶点社区教育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相互促进,完善社区教育支持体系,从而提高社区教育资源运用效率。

4. 利用现代化信息工具,丰富易扶点社区教育形式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所带动工业化4.0的到来,“学习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适当的员工教育和培训的手段和方法”,^[14]同样,搬迁居民社区教育的学习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的手段与方法,针对易扶点差异化的社区教育需要,利用现代化信息工具,可以拓宽社区教育服务渠道,丰富社区教育形式。2016年出台的《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指出:“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开放便捷的社区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及体系”。^[15]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教育手段,合理使用线上教育和网络课堂,丰富搬迁居民社区教育形式;同时,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建立社区教育网络平台,统筹区域内社区教育网络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从而满足不同搬迁居民教育的个性化消费需求,推动学习型社区的发展。

5. 提升搬迁居民文化适应能力,培养搬迁群众主动学习的社区意识

“社区意识是形成社区凝聚力的前提,其核心成分是指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与参与感。”^[16]易扶点社区群众的社区意识与其文化适应能力密切相关,“文化适应是指个体或群体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与其母体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中后,基于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和感情依附而作出的一种有意识、有倾向性的行为选择和调整。”^[17]提升易扶点社区文化适应能力,要立足于搬迁居民的生计和文化现状。一方面是生计文化的适应问题,要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力度,帮助搬迁居民掌握新的生产方式和生计技能,快速推动搬迁居民由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化,使其生计能力能够快速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生活文化的适应问题,要在社区教育中广泛开展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活动,营造参与氛围,提升参与能力,激发搬迁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热情,从而培养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意识。此外,调研中我们也发现,语言不通也是易扶点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社区教育应加大在易扶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力度,提高普通话普及程度,提升普通话普及质量,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语言文化修养。

七、结束语

推动易扶点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重要举措。如前所述,易扶点社区教育的目的在于以空间转换的方式帮助生态贫困居民摆脱生计贫困,最终促进居民内生发展,即确保易扶点社区居民的生计逻辑到发展逻辑的实现。可以说,易扶点社区居民的生计逻辑、市民逻辑、效率逻辑、教育逻辑和发展逻辑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各“逻辑”之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逻辑之间联系紧密,其最终目的是培育易扶点居民的内生发展动力。社区是易扶点居民安置的主要聚居单位,社区教育对搬迁居民的生计、生活、意识、观念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加之易扶点社区居民身份的特殊性,五个“逻辑”的实现最终主要依托社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高质量的社区教育体系达到赋能社区居民本身的目的。此外,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推动易扶点友好型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教育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后搬迁时代需要把对易扶点“物”的关注转移到易扶点居民身上,因而,如何继续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从而更好地培育易扶点社区居民的内生动力是今后需要关注的话题。

【参考文献】

-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EB/OL]. (2020-12-03)[2022-03-27]. https://www.ndrc.gov.cn/fzggw/wld/zcx/lddt/202012/t20201203_1252215.html.
- [2] 杨智,杨定玉,陈亦桥.城乡融合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教育发展探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1,33(1):56—64+86.
- [3] 罗银新,胡燕,滕星.从鸿沟到共生:易地扶贫搬迁人员文化适应的特征及教育策略[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12(5):38—44.
- [4] 陈全功,程蹊.空间贫困理论视野下的民族地区扶贫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31(1).
- [5] 白永秀,宁启.易地扶贫搬迁机制体系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8(4):62—74.
- [6] 徐锡广,申鹏.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1):103—110.
- [7] 汪磊,汪霞.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J].探索,2016(6):93—98.

- [8]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 (2014-03-16) [2022-03-27]. http://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
- [9] 何玲玲, 吕翠丽. 易地扶贫搬迁与搬迁人口市民化耦合研究: 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实践表述[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83—110.
- [10] 毛丹. 赋权、互动与认同: 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J]. 社会学研究, 2009(4).
- [11] 程军, 陈绍军. 逆向泛标签化现象何以形成: 基于弱势群体情感的视角[J]. 学术界, 2015(12): 89—98.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
- [13] 张永. 社区教育内涵发展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4.
- [14] 杨进. 工业4.0对工作世界的影响和教育变革的呼唤[J]. 教育研究, 2020, 41(2): 124—132.
- [15] 教育部, 等.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EB/OL]. (2016-07-29) [2021-07-16].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6n/xwfb_160729/160729_sfcl/201607/t20160729_273300.html.
- [16] 晓枫, 罗志强. 我国社区教育中居民参与的几个主要问题[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2): 67—76.
- [17] 杨甫旺. 异地扶贫搬迁与文化适应: 以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08, 28(6): 127—132.

Practice Logic and Problem Refle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WU Qian-lian¹, CHEN Jie¹, FENG Li², LI Xiang¹

(1. School of Educatio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2. College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the endogenous force of relocated residents,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key work of the follow-up suppor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of fou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this paper examines four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ubject, community education content, community education form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goal. It is found that the practice logic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is reflected in five aspects of livelihood logic, citizen logic, efficiency logic, education logic and development logic.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w level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absence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learning subjects, the lack of family education content, and the emphasis on form rather than connotation in thanksgiving education.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mechanism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dig the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ourses and teacher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to form a joint force of the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resour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ximum effec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 modern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tools to enrich the diversified community education mod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relocated residents and cultivate the community awareness of relocated people to actively learn.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 community education; practice logic; endogenous development

(编辑/关永承)